

48年前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 冷玉龙：“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

难得夸人的冉友侨教授肯定了他

查资料、编卡片，很苦。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对于当时才21岁的冷玉龙来说，难免显得枯燥。冷玉龙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当时的编写成员，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实习研究员，大概20多个人，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那个大办公室是学校图书馆专门为编写组腾出来的一个大阅览室。大家就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埋头苦干。”

长年累月，坐冷板凳，慢慢的，感觉来了。越往深处走，冷玉龙发现，编写字典虽然枯燥，但也不乏乐趣。冷玉龙有一段时间负责编写化学元素字，“我又不是学化学的。很多知识就得去请教化学方面的专家。专门跑到化学教授家里请教，还到图书馆去找书看，这样才能保证编稿在化学常识上不出问题。写稿后给化学教授看，让其把关。”后来稿子送到川师编写组组长冉友侨教授处审读时，冉教授非常满意。在路上遇到冷玉龙，高兴地说：“玉龙同志，你的稿子编得很好啊。”

听到这样的夸奖，冷玉龙高兴极了。冉教授是《汉语大字典》四位副主编之一（赵振铎教授的师兄），治学严谨，有典型的章黄学派风格，从不轻易

在《汉语大字典》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一个编纂者火热、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心。原来简练的字条背后，凝聚着千锤百炼的心血和智慧。

小说《编舟记》中，一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接力，与一位学者主编共同完成一部中型日语词典，花费了15年。在四川，也有一些人，也是花费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青春岁月，陪伴了一部字典的诞生，上演了真人版的“川版《编舟记》”。

1975年，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在四川、湖北两省启动。刚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冷玉龙，还没正式踏出学校大门，就被选中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当时跟他一起留校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同学有20人。其中10人被留在校本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另外10人到了川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当时有人称他们这批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编写的年轻人“为《汉语大字典》炒的一盘菜”。



198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全体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冷玉龙)。受访者供图

夸奖一个人，而冷玉龙得到了他的肯定，能不高兴吗？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冷玉龙说：“刚开始时，由于我的编写资料卡片做得不好，受到了冉老师批评，我还不服，顶过嘴，气得老师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我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不适合我，有过另寻门路的想法，最后经过一番斗争，还是坚持下来了。谁知埋头苦干几年，稍有一点进步，老师竟如此肯定。后来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川、鄂两省编写工作会，冉教授派我参会，并代表大字典川二组作大会发言。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一个小不点儿会受到如此重视。”

编字典，要有一点圣人精神

让冷玉龙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是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全日制进修学习编字典那一年。那是1983年，在川师编写组的部分工作即将完成时，冷玉龙和另一位同学被抽调

到《汉语大字典》编纂处（附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工作前，被组织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词典编辑进修班学习。这是为完成国家辞书编纂规划任务，当时的文化部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一个词典专业进修班。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上课时讲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促使他坚定了职业信心。“陈先生讲，编字典、审字典这活儿，苦啊！那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是做不到的。原来被我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被评价这么高，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冷玉龙说。

当时全国有20多人参加这个班，四川有两个名额，冷玉龙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殊为难得的学习良机。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室里上课，授课老师都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或出版界的顶级专家。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词

典学是人大胡明扬教授授课，文字学是北大曹先擢教授授课，音韵学由北大陈复华教授授课，北师大许嘉璐教授上训诂课。王力、阴法鲁、吴小如、姜亮夫、陈原等一流学者都来上过课。

从北京回来后，冷玉龙就在《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从事辞书编审工作，后来在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辞书出版社，他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冷玉龙从一名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编写骨干，成为专业的辞书编审，成为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后来成为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并一度担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冷玉龙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群川版《编舟记》主人翁的缩影。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能从辞书界的一个小不点儿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外，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辞书编审过程中与十多位教授一起摸爬滚打十多年，要想不进步都难。从21岁到60岁退休，一直从事辞书工作，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四川不止一个，他们把自己的黄金年华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事业。我的同事师初阳、吴继琼、罗韵希、张企予等，都是如此。”

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在一部书上，这样值吗？冷玉龙觉得是值得的。虽然大家多年的付出最后只出了一部书，但成果出来之后，那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喜悦感是做别的书难以比拟的。“如果把时光拉长一点，多年以后，也许这部精心编纂的辞书还在发挥作用。”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考古学家“跨界”出散文集

“大家好，我是非虚构作家许宏。我近些年有一个念想，就是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甚至非虚构作家，没想到，这个梦很快就圆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前写的这些东西，居然还可以被称为散文，现在居然成了作家。”近日，曾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20年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考古学家许宏携带他的散文随笔集《许宏的考古“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亮相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学术随笔走出象牙塔

作为考古人，许宏入行40余年，当了20年的考古队长，亲手发掘出“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主编过天书般的考古报告，出版了砖头厚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他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考古纪事本末”系列、学术自选集系列图书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是图书市场上的热销品。近些年，他逐步从“田野”走向“沙发”，积极投身公众考古普及，在喜马拉雅上侃“宏观考古”，成为B站

的UP主，为年轻人科普考古知识。如今跨界成为作家，为读者带来他的首部散文随笔作品。

考古学具有本源性学科特色，其成果辐射和影响其他学科。因其专业和神秘，令圈外人难以走近。许宏的学术随笔，走出象牙塔，将圈子内的学术成果，以散文的形式，回馈于社会公众。

《许宏的考古“方”》分为《装作有闲》《透物见人》两册。书名里的“方”，既包含田野考古里的探方，也囊括了考古人从方法、方略上的思考。相较于他以往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学术著作，随笔文字更贴近大众读者，轻松好读。《装作有闲》中既有作者对考古命题的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也有短评微论的真知灼见；既有蓦然回首青春的感慨，也有生活中的风雅诗兴，普通人的烦恼和小确幸；《透物见人》中有对恩师的深情缅怀，对师友难以忘怀；有对考古圈子的思考；有严谨而不失灵动的自序、他序及后记；有写书的心迹留痕，也有读书的所悟所得……

这些散文随笔作品，没有专业学术论文的艰深枯燥，语言干净准确，表现力

强，有着恰如其分的典雅从容，文风坦荡、自信、刚健、清新。与此同时，他又始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做过多推衍。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研判，行文看似诙谐轻松，持论依然严守学者的严谨和学术的庄重。可以说，这套书是向读者全景呈现许宏走过的路、研过的学、见过的人、探过的方、读过的书、说过的话。

向公众传播所学所思

许宏说，如今他越来越认同，对大众知识普及工作和学术研究之间可以相辅相成，“大众会提出很多极其质朴的基础问题，会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反思学术专业上的一些课题。到目前，我已经不把纯学术和科普完全分割开了。比如河南文艺社给我的《溯源中国》，就是我的自选集，但是同时因为出版社的努力，它已经成为面向大众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我们应该向公众传播我们的所学所思。”

在很多年里，许宏不光活跃在田野考古的一线，还经常和网友互动，并经常现身许多论坛和考察活动中。可以



《许宏的考古“方”》

说，跨界和出圈对许宏来讲已经成为常态。而考古科普，不仅普及了历史考古知识，也激发了公众对考古和文物的关注和参与积极性，促进大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对于许宏这种与公众间的频繁交流，考古学家王仁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眼光来看考古学的科普。我认为，一切考古都属于公共考古。我们获得的田野考古项目，发掘的田野考古的资料，都是公共资源，然后我们把获得的知识再反哺社会，何乐而不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